

# 传统观念与个人理性的碰撞： 80后知识精英婚恋观研究

马妍

**摘要:**从中华5000年历史沿袭而来的传统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现代性理念共同影响着80后知识精英的婚恋观,形成了他们统筹兼顾的相对理性择偶观、双重标准和适度开放的性观念、坚持婚内生育的子嗣观、相信婚姻也注重理性的情感观、以及坚持夫妻有别和注重财产保护的家庭经济观。每一个方面的婚恋观都体现出80后知识精英对婚姻传统的坚守和对个人理性的崇尚,是对两种力量无奈的妥协和巧妙的融合。

**关键词:**传统观念 个人理性 婚恋观 80后知识精英

##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我国全面实施,以此为标志,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批以独生子女为代表的群体被冠以“80后”的称谓。80后群体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在社会变迁急剧发生的时代,成熟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年代,他们在规范的国民教育体系中既接受了当代先进科学知识的熏陶,也接受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洗礼;同时,在中国这个“家本位”的社会中,虽然家庭规模日趋核心化,但是通过家族体系和家族文化的传承,传统的价值观也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因此,传统和现代化的力量都在80后身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让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当代价值观。

随着80后群体逐步进入大学教育阶段、完成学业、顺利就业、结婚甚至是生子,他们正处于生命历程中最动荡和多变的阶段。出生和成长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他们,在经历自身的恋爱和婚姻时,时代特征塑造了他们怎样的婚恋观?他们的婚恋观是否也伴随着社会变迁的剧烈开展呈现出独有的特征?传统的价值观是否仍对这一代人的婚恋观存在持续的影响?因此,作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通过婚姻家庭观这个侧面探究80后群体的生存状况、生活态度和价值理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开展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基本状况调查数据,该调查是专门针对80后群体开展的,于2010年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收集,在抽样方案上采取了主观抽样和随机抽样结合的办法,第一期在6所985高校(吉林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进行,共收集到4655份毕业生问卷和6782份在校生问卷。由于调查对象集中于985高校,因此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80后群体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群体。80后知识精英群体是80后群体中的典型代表,也是影响社会未来走向的群体,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尤其是婚姻家庭观,可能有别于普通的80后群体呈现出更多的理性色彩。因此,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特别关注,我们不仅可以窥探80后群体婚姻家庭观的概貌,而且可以探究传统观念和现代个人理性两种力量的在他们身上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塑造了他们有别于其他年代群体的婚姻家庭观。

婚恋观是个体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是一种主观标准和价值倾向,但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个时代特定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建国60年以来,我国人口的婚恋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由建国初期传统婚恋观向自由婚恋观的转变,六七十年代向政治化婚恋观的转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婚恋观向多元化的转变(陕劲松,

2010)。婚姻家庭观研究是婚姻家庭研究中的一个传统,也是透视各个时期青年群体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往的婚恋观研究主要包括:(1)对青年群体婚恋观的状况的描述(单光鼐,1986)。(2)对特定群体婚恋观的关注,如对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婚恋观的研究(王美萍,2009;李景华,2011),还有对农村青年婚恋观的研究(张承芬、陈英敏,2000)。(3)对婚恋观变迁的梳理(罗渝川、张进辅,2001;陕劲松,2010)。(4)对婚恋观影响因素的分析(骆剑琴,2011)。相关研究对于婚恋观的特征描述较多,而较少关注群体的内部差异和差异的内在形成机制。同时由于80后群体刚刚进入适婚年龄,因而尚未有对于80后婚恋观的研究,因此有必要通过对于80后知识精英群体婚姻家庭观状况的探究,来反映当代青年婚恋观的状况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而把握80后青年群体的价值观。

由于适龄人口的结婚年龄普遍推迟,因此,虽然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已经陆续进入而立之年,但我们调查发现其中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处于未婚状态,结婚的比例还比较有限,普遍晚婚成为80后知识精英的又一显著特征。虽然大部分80后群体尚未成家,但是对于未来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处理方面也不乏独特的观念和见解。婚恋观是多维的,包括个体在其整个恋爱、婚姻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态度和价值观,结合以往研究和本研究数据的特点,本文对80后知识精英群体婚恋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选择结婚对象的择偶观、处理两性关系的性观念、关系家庭传承的子嗣观、决定婚恋走向的情感观和调节家庭经济关系的经济观。

此外,由于80后出生成长时期的特殊性,其婚恋观始终交织着传统和现代两种力量,5个方面的婚恋观也呈现出不同的倾向,究竟是倾向于传统性还是现代性?所谓现代性是伴随着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程出现的。现代性是以理性和自由为根本,表现为理性和世俗化的过程。理性主义精神即是打破传统、旧俗、迷信和巫术的束缚,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开始的赞美人的价值的传统肯定了人世间对爱情、幸福和人生享乐的合法性(刘汶蓉,2010)。以启蒙为核心的现代性决定了现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道德实践,这直接推动了以“反对性活动以家庭为本,以生育为目标”的性解放运动为代表的文化个人主义(刘汶蓉,2010)。其中,在个人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领域呈现出的是个人现代性(陈嘉明等,2001)。韦伯把理性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所谓理性化,其基本含义是指理智的思考与计算(陈嘉明等,2001)。因此,本文对80后知识精英婚恋观传统性的或现代性的倾向探讨就建立在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化为探究传统观念和个人理性如何在80后知识精英婚恋观的不同方面发挥影响,造就了他们独具特色的婚恋观。

## 二、80后知识精英的婚恋观

### (一)择偶观的传统与现代:注重内涵和能力兼顾经济条件

择偶标准是男女选择结婚对象的条件或要求,择偶标准随着社会变迁的进程不断变化(徐安琪,2000;徐安琪、李煜,2004)。从古代倡导“门当户对”,到建国初期的强调政治面貌和家庭出身,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盲目崇拜知识分子,直到新千年出现“金钱至上”的择偶标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究竟摒弃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又新增了什么?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一代青年人,80后群体已经陆续进入婚姻生活,在他们选择伴侣的过程中,遵循怎样的标准,对于不同标准的重要性又持怎样的态度?不同标准的权衡如何体现传统和现代的碰撞?

我们的调查主要从经济条件、相貌气质风度、学历能力、性格、家庭背景5个方面考察80后知识精英的择偶观,分析他们择偶时对不同的因素有怎样的侧重。从总体上看(如表1),首先,对于三个客观条件——经济条件、学历能力和家庭背景,80后知识精英对于经济条件的观点两极分化,各有约40%的被调查者认为它“不太重要”和“比较重要”,因此这个条件的重要性是因人而异的;而对于学历能力的重要性,他们比较集中地肯定了其重要性,有超过60%的人认为这个条件比较重要,还有约16.5%的人认为这个条件是择偶时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家庭背景这个因素,他们倾向于

否认它的重要性,即认为它比较不重要的比例高于认为它比较重要的比例。其次,对于相貌气质风度和性格这两个涉及主观感受的条件,80后知识精英群体中对相貌气质风度这个略显“肤浅”的因素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好,约有66%的人认为这个因素在择偶时是比较重要的;而对于性格这个内在因素的重要性,他们也比较一致地给予肯定,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这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剩下一半的人也基本认为这个因素是比较重要。

表1 80后知识精英择偶标准分布 (%)

	无关紧要	不大重要	比较重要	必不可少	合计
经济条件	10.40	40.03	42.28	7.29	100
学历能力	2.28	15.57	61.77	20.38	100
家庭背景	13.78	50.47	32.02	3.73	100
相貌/气质/风度	1.81	15.93	65.74	16.52	100
性格	0.83	1.42	46.56	51.18	100

综合被调查者对五个因素的看法,我们得到了关于80后知识精英择偶影响因素的排序(如图1)。在五个因素中,首先,配偶的性格是80后知识精英择偶时一致认为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其次,对方的学历和能力、相貌气质和风度几乎是并列第二的影响因素,这种轻微的分化表明在80后知识精英内部对于这两个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倾向,但整体上是比较重视这两个因素的;再次,经济条件对80后知识精英择偶的影响仅位列第四,处于一个不是太重要的地位;最后是家庭背景因素被置于一个相对最不重要的位置。这一排序充分反映了80后知识精英较为理性和现代的择偶观,弱化了自古以来强调的“门当户对”择偶观,摒弃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唯家庭出身论”的择偶观,也没有屈从于新世纪“金钱至上”的择偶观,而是在自身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前提下,虽然没有完全抛弃外貌这一外在因素达到完全理性的选择,但是确实比较理性地把握了婚姻的实质内容,即以内在的匹配度为选择配偶标准,注重所选对象的内涵和实际能力,同时适当考虑经济条件确保婚姻生活的物质保障不至于完全受到影响。这种统筹兼顾的择偶观应当说是比较合理和理性的,也凸显了80后知识精英在相对宽松和充裕的生活环境中、选择相对自主的情况下以及位处婚姻市场相对高位的前提下,顶住了当代多种非理性择偶观的干扰,形成了自己一代独有的择偶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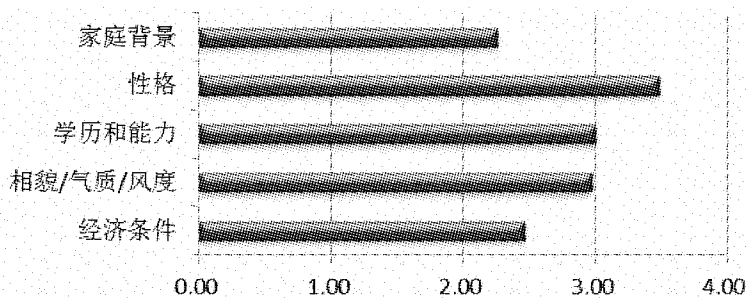


图1 80后知识精英择偶因素排序

此外,80后知识精英的择偶观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如图2)。与总体的排序基本一致,在80后知识精英中,男性和女性择偶时最注重配偶的性格因素,而最不看重对方的家庭条件。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中间几个因素,女性在择偶时对学历能力和经济条件的重视程度均高于男性;男性对相貌气质风度的偏好程度不仅超过女性,而且这一因素是男性择偶时第二重要的因素,学历和能力因素排在其后,这也是两性差异最显著的地方。男性和女性关于择偶影响因素的不同排序,表明80后知识精英群体在遵循总体上相对理性择偶观的同时,也充分考虑自身性别的优势和劣势,

做出更有针对性的选择,符合传统的“郎才女貌”的婚姻匹配观。因此男性在择偶时会更注重“女貌”,而女性会更倾向于“郎才”,这一结果也回应了我们在整体考察80后知识精英的择偶影响因素排序时,发现学历能力和相貌气质风度的排序几乎一致的结果,这种分化基本上是性别差异的影响造成的。同时由于女性整体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相对的劣势,因而在进行择偶决策时,视男方经济条件状况与相貌气质风度几乎为同等重要的因素,这表明80后知识女性在择偶时可以为家庭经济的稳定性牺牲一些个人的主观审美需要,也不失为一种理性择偶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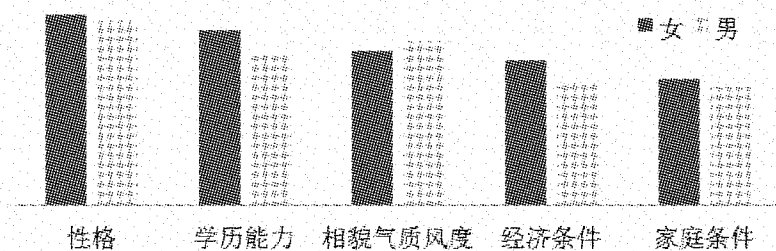


图2 80后知识精英择偶影响因素排序的性别差异

## (二) 性观念中的传统与现代:对长期关系和瞬时关系的双重标准

性观念是婚恋观中传统与现代分野最清晰的一个领域,很多相关研究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的性观念呈现出更加宽容和开放的趋势(刘汶蓉,2010)。那么在这个所谓受现代性解放影响较大的领域内,传统的观念是否还有一席之地,传统与现代的力量在这一方面如何影响80后知识精英的婚恋观?我们拟通过了解80后知识精英对于“性伴侣数量”和“一夜情”的态度来考察他们处理婚外<sup>①</sup>两性关系的性观念具有怎样的特征。

在中国道德和法律双重导向婚内性行为的前提下,“性伴侣”一词可以说并不可能存在于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是一个纯粹的外来概念,因为在已婚<sup>②</sup>的状态下,合理合法的性伴侣就是配偶,配偶的数量必然是唯一的,如果存在其他的性伴侣,是为道德和法律所不容的;同样的情况如果出现在非婚阶段,依然是道德舆论所诟病的。因此,在传统道德观念的引导和现行法律的约束下,中国人普遍没有多个性伴侣。而80后知识精英也较好地继承了这种关于婚外两性关系的传统,他们当中超过80%的人不同程度地反对“一个人若只有一个性伴侣太受限制”的说法(如图3),绝大部分人愿意坚守道德底线忠于自己的配偶,甚至是没有婚姻契约的伴侣,这反映了80后知识精英群体婚姻家庭观较为保守和传统的一面。而这种传统性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80后知识女性中,反对多个性伴侣的比例超过90%,比男性高出将近18个百分点。

与“性伴侣”在相对长的时间内维持固定不同的是,“一夜情”作为一种“即食”型、一次性的两性关系,80后知识精英对其的态度也有别于“多个性伴侣”的情形。虽然总体上,他们对于“一夜情”的态度是反对甚于赞成,但反对的比例较“多性伴侣”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即大约有40%的人认为两厢情愿的一夜情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他们的性观念仍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同在某些情况下寻求一些生活的刺激和冒险是合理的,这明显是受到了当代性解放、性和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离、性和爱情在某些时候也可以不对应的西方性观念的影响。同样,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整体上反对的呼声没有多个性伴侣的情形高,但是80后知识精英内部也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约

<sup>①</sup> 本文所界定的婚外包括婚姻以外的两种情形:一是已婚群体在其婚姻以外的范围内的范围;二是未婚群体在未进入婚姻以前,实质上也是处于婚姻以外的范围,将第二类情况也列入婚外的情形。

<sup>②</sup> 由于80后知识精英中仅有四分之一的被访者已经结过婚(包括初婚、离婚和丧偶),离婚和丧偶的比例非常有限,因此本文将处于离婚和丧偶状态的被访者与初婚状态的被访者都归为了已婚的类别中,以便集中比较从未结过婚的80后知识精英群体与已经结过婚的群体存在内部差异。

有73%的女性对于一夜情持反对态度;而男性中支持一夜情的比例略高于反对的比例,这甚至与整体的趋势是相反的,这充分凸显了80后男女两性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犯规成本”的差异和对传统观念坚守程度的不同,而出现了迥然相反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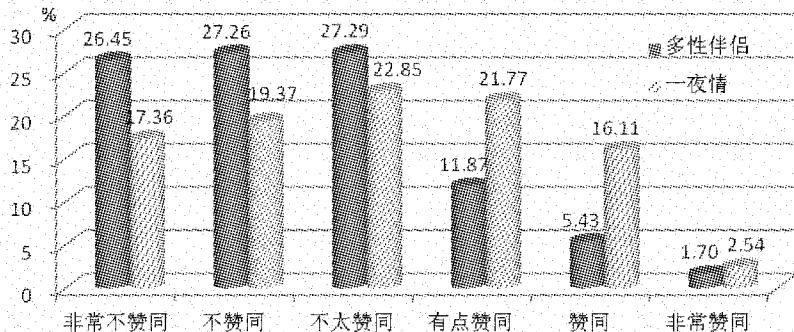


图3 80后知识精英对婚外两性关系的看法(%)

80后知识精英在处理相对长久的(性伴侣)和短暂的(一夜情)两种婚外两性关系时表现出的看似矛盾的态度,充分反映了他们处在这种社会快速转型的时代,挣扎在传统观念性观念约束下和现代新兴性观念冲击中,做出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坚持维持传统的单一性伴侣两性关系模式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偶尔放松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去体验与传统规范要求完全不同的一夜情经历,做出一种不求最优但求较优的选择。虽然其初衷不一定为社会主流道德规范所认可,但也是一种相对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传统观念和个人理性两种力量在80后知识精英身上碰撞的结果,也是他们传统与开放并蓄的婚姻观的体现。

### (三)子嗣观的传统与现代:婚内生育仍是主流选择

传承子嗣是人类繁衍和文化遗产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载体,也是婚姻的一个重要功能,因此世界各国的文化中都有提倡婚内生育的传统,尤其是中国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将子女的生育行为与对父母尽孝联系在一起,给生育这一行为赋予了微观重要意义。同时,在21世纪这个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时代,青年一代的生育也是各人口老龄化国家维持人口更替和确保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这些国家往往非常鼓励适龄青年的婚内生育行为。虽然我国奉行计划生育国策,提倡一个家庭只生育一个子女,但也不主张夫妻在婚后完全放弃生育下一代。然而与国家大力倡导传承子嗣相冲突的是,随着经济大力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为了追求事业甚至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爱情,放弃了生育子女,成为所谓的丁克(DINK: Double Income No Kids)一族,其家庭传承和未来养老问题成为社会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对于愈演愈烈的丁克现象,80后知识精英的看法是我们据以了解他们婚恋观的一个主要方面。

“对于婚后不要孩子很遗憾”这一观点,80后知识精英的看法高度一致,他们当中有80.51%的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赞同(如图4),而且就赞同的程度而言,赞同和非常赞同的比例非常高,这表明“丁克”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并不是80后知识精英的主流,绝大部分人仍然愿意选择有孩子的婚姻生活,愿意通过孩子来实现自身和家庭甚至家族的传承,由此我们不难看出80后知识精英对于维持传承子嗣的婚姻传统有较为强烈的意愿。当然由于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仍未真正进入婚姻生活,不排除现在的意愿只是暂时的。但是相信在如此强烈的意愿驱使下,绝大部分80后知识精英最终不会选择丁克家庭。而当我们比较80后知识精英中男性和女性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发现女性支持丁克家庭的比例竟然高于男性,这与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女性更坚持婚姻传统的普遍规律有所不同,这可能是由于生育和抚养孩子对新时代的高学历职业女性有着更高的机会成

本,所以她们会更倾向于选择丁克家庭,表现出比男性更加反对婚姻传统。在子嗣观这个方面,虽然“丁克”这种现代化的观念日益普及,但婚内生育这种传统观念仍然是主流,可以说传统的力量在子嗣观这个方面占据了明显优势,是80后知识精英婚恋观中维持传统性的集中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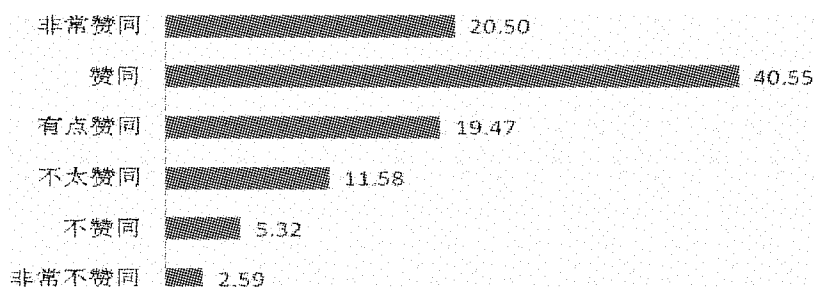


图4 80后知识精英对维持婚姻传统的看法(%)

#### (四)情感观的传统与现代:相信婚姻和理性情感观的萌芽

情感是婚恋中的基础和核心,决定了婚恋的开始、发展、走向和结局,因此情感观也是婚恋观中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方面。关于80后的情感观我们主要从他们对婚姻与爱情的关系、感情对婚姻存续的影响和反映夫妻亲密度的夫妻隐私,三个方面来考察传统和现代两种力量的关系。

首先,关于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文学作品里通常将其比喻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这种将爱情和婚姻截然对立的消极婚姻观,有将近90%的80后知识精英对此持不同程度的否定态度(如表2),剩余10%的赞同者的赞同程度也集中在比较低的区域,所以整体上80后知识精英较为排斥消极的婚姻观,并不认为爱情会被扼杀在婚姻中,对婚姻仍然持有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

表2 80后知识精英对调和家庭关系的看法 (%)

	非常不赞同	不赞同	不太赞同	有点赞同	赞同	非常赞同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20.42	33.52	34.41	8.72	1.95	0.98
感情不好应离婚	4.21	12.26	33.12	24.18	21.50	4.74
侵犯私密不道德	4.10	12.57	32.14	28.24	17.54	5.41

其次,关于感情对婚姻存续的影响,我们询问考察80后知识精英对“感情不好应该离婚”这一问题的看法。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奉行的是“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反对离婚,从一而终的观念限制了人们对不合理的婚姻进行再选择的机会,离婚也一直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然而伴随着感情决定婚姻存续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感情的和谐度逐渐取代道德成为人们判断婚姻存续的主要标准,离婚开始渐渐为公众舆论所理解和宽容。80后知识精英对于以感情来判断婚姻存续的问题存在着截然两分的看法,总体来说支持这一观点的比例和反对这一观点的比例各占一半,而且整体上态度偏向温和,大部分人集中在支持和反对程度都比较低的区域(如表2)。这表明80后知识精英群体认为“感情不好”这个标准虽然是决定婚姻存续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不能仅凭这一个标准就武断地决定一段婚姻的存续问题,还需要综合权衡其他的影响因素,因此他们对于这个因素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或反对,这是他们较高受教育程度培养出他们具备谨慎而理性的思维习惯的一种表现。在这个问题上,80后知识精英既有维持不轻易离婚的传统的意愿,也怀有不为婚姻牺牲感情的现代理性思维,传统观念和个人理性的影响可谓不分伯仲。

再次,对于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的隐私权究竟是否应当有边界,这种边界是否不应该存在于家庭中,存在于夫妻之间,80后知识精英的看法再次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支持维持隐私和反对的比例

平分秋色,而且赞同和反对的程度都集中在较低的区域。这表明与感情和婚姻存续的关系一致,对于夫妻这种在社会各类群体中亲密度最高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究竟应当“亲密无间”还是“亲密有间”,大部分人尚未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偏好。一方面明确自身的隐私是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因为过于强调个人隐私而影响了夫妻之间的信任度和亲密度,所以对于这种问题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也再一次反映出80后知识精英群体的婚恋观是对多方面冲击和压力(尤其是婚姻传统和现代理念的冲击)不同程度妥协后形成的一个传统基础上相对理性的婚姻家庭观。

综上所述,80后知识精英的情感观整体上倾向于传统的一边,但现代的影响也日益上升。表现为他们仍然相信婚姻的价值,也坚持感情虽然重要但它不是判断婚姻存续的唯一标准,婚姻是不应该轻易放弃。同时一些理性的情感观也在萌芽,对于夫妻的隐私他们并不认为应当像婚姻传统所倡导的那样夫妻之间亲密无间,对于自我空间的强调和个人隐私保护意识的强化,促使他们开始追求夫妻之间的亲密有间。

### (五)家庭经济观的传统与现代:坚持夫妻有别注重财产保护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经济关系的妥善处理问题日益成为当代家庭关系的突出问题。家庭的经济关系可能涉及到家庭生活的多个方面,基于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的调查重点考察了80后知识精英对于婚前财产公证和家庭生活夫妻AA制这两个问题的看法,试图以此了解他们的家庭经济观,探究80后知识精英对这两种现代气息浓厚的婚恋观具有怎样的倾向,以及个人理性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完全超过了传统观念。

首先,由于离婚现象的日益普遍和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敏感度与日俱增,家庭财产在离婚后的归属就成为一个现代家庭经济关系中的常见问题,新的婚姻法也通过不断的修订来完善对这一环节的法律调节。而在基于婚后家庭财产夫妻共有的前提下,婚前财产的归属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因此针对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公证与否的问题也成为当代青年人组建家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婚前财产是否需要在结婚以前进行公证,80后知识精英群体倾向于赞同的比例是倾向于反对的1.7倍,约有63%的被访者不同程度地支持婚前财产公证(如表3)。这充分体现80后知识精英群体的理性婚姻观和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认为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最为有效和合理的途径,也并不认为婚前财产公证是对配偶不信任的表现。虽然婚前财产公证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人们对于理想爱情的憧憬,但是权衡利弊后进行公证无疑是一种利大于弊的理性决策。

表3 80后知识精英对调和家庭关系的看法 (%)

	非常不赞同	不赞同	不太赞同	有点赞同	赞同	非常赞同
婚前财产需公证	4.37	10.30	22.17	30.97	26.46	5.74
夫妻AA制	13.05	23.39	28.66	21.24	11.90	1.76

其次,作为个人现代性的典型体现——两性平权(即在家庭中夫妻两人地位相同,没有一方享有特权)的理念也逐步延伸到了日常的婚姻生活中,婚后家庭财富既然是双方共有的,那么在财富的积累和使用方面也应当遵循一种平等的机制,由此衍生出了所谓的“夫妻AA制”。“夫妻AA制”的核心特征是夫妻双方经济独立和家庭消费共担,充分体现了当代家庭中夫妻平等的理念。对于夫妻之间是否应当实行AA制,约三分之二的80后知识精英群体对此持反对意见,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AA制在家庭生活中是可行的(如表3)。一方面这表明中国传统的“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观念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即使在社会各领域都在倡导男女平等,但是相对平等才是女性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在各方面都强调男女平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而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因此女性即使追求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独立,也不会主动要求在家庭消费中也要绝对独立。另一方面,从规模效应的角度而言,理性的家庭财富使用模式是集中家庭财富并合理地运用到恰当的地方,而非刻意追求所谓的平等使家庭资源的使用相对分散,无法实现规模效应。因此,作为理性的高级知识分子,

80后知识精英可能认为夫妻AA制不利于合理有效地使用家庭资源,而且可能破坏家庭的凝聚力,所以他们并不偏好这种所谓“时尚”的家庭关系,而更倾向于传统的“男女有别,各司其职”的夫妻关系和“家庭财富集中统一使用”的家庭财富使用模式。

总体而言,在家庭经济观方面,虽然我们刻意考察了80后知识精英对两种较为现代的经济观的看法,但是结果并没有表明他们一味地支持现代性很强的观点而完全抛弃传统的观念,相反他们在广泛受到现代观念冲击的同时也理性地反思这些观念的弊端,并试图以传统观念的优势给予弥补,再次体现出其理性婚恋观的特点。

### 三、总结与讨论:传统观念和个人理性的碰撞

从中华五千年历史沿袭而来的传统,作为一套以往的行为规则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而它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投射到80后群体的身上,成为一股影响他们婚恋行为和观念的不容小觑的力量。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也将崇尚理性的现代理念引入了现代人的各种观念中,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成为了影响80后群体的另一股力量,训练他们如何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在婚姻和家庭的决策做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在这两种力量的碰撞下,形成了80后群体独有的婚恋观,同时这两种力量在婚恋观的不同方面体现出不同的影响力,既有现代性力量强于传统观念的方面,也有传统观念占主导的方面,还有两者不分胜负共同主导的方面。两种力量碰撞的结果,在80后知识精英身上由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而被放大,形成了他们统筹兼顾的相对理性择偶观、双重标准和适度开放的性观念、坚持婚内生育的子嗣观、相信婚姻也注重理性的情感观、坚持夫妻有别和注重财产保护的家庭经济观。每一个方面的婚恋观都体现出80后知识精英对婚姻传统的坚守和对个人理性的崇尚,是对两种力量无奈的妥协和巧妙的融合。

#### 参考文献:

- 陈嘉明等,2001,《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
- 李景华,2011,《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实证研究》,《教育与职业》第33期。
- 刘汶蓉,2010,《婚前性行为 and 同居观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现代性解释框架的经验验证》,《青年研究》第2期。
- 罗渝川、张进辅,2001,《从20世纪的最后年看我国青年婚恋观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骆剑琴,2011,《网络对青少年婚恋观的影响及对策》,《人民论坛》第29期。
- 陕劲松,2010,《60年来我国婚恋观的变迁》,《理论探索》第1期。
- 单光庸,1986,《中国青年婚恋观的变化趋势》,《青年研究》第7期。
- 王美萍,2009,《社会变迁背景下大学生婚恋观的特点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当代教育科学》第13期。
- 徐安琪,2000,《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徐安琪、李煜,2004,《青年择偶过程:转型期的嬗变》,《青年研究》第1期。
- 张承芬、陈英敏,2000,《当代农村青年婚恋观的调查》,《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易众